

简述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的研究现状

摘要：被称为欧洲当代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的帕慕克，开辟了土耳其文学通向世界的民族通道。《我的名字叫红》更是备受关注，因此历来受到不同地域、国家人们的多重解读。本文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在借鉴已有评论的基础上，从国内外两个角度辐射研究，分别就译本、期刊论文和书评，以及各自的研究方向分别进行阐释，以求获得关于帕慕克研究最为清晰的研究发展脉络。

关键词：帕慕克 我的名字叫红 东西方

一、国外研究现状

1、译本：国外学者关注帕慕克的作品要早一些。《寂静的房子》获得欧洲发现奖之后，帕慕克就开始进入国外研究者的视野。帕慕克的部分小说在九十年代就有了英译本、西班牙译本，以及德文译本。最早在1990年维多利亚·霍尔布鲁克(Victoria Holbrook)就翻译出版了The White Castle。也在1998年3月，由Vintage出版社出版。帕慕克其余的小说则在2000年之后被陆续翻译出来：My Name Is Red (Vintage, 2002); Snow (Vintage, 2005); Istanbul: Memories and the City (Vintage, 2006); The Black Book (Vintage, 2006); Other Colors: Essays and a Story (Faber & Faber, 2007); The Museum of Innocence (Knopf, 2009)。

总体上来说，外国的译介情况稍早于我国。帕慕克被关注的主要原因是他作品本身所拥有的无限魅力。帕慕克有几部重要作品，《雪》、《黑书》、《我的名字叫红》和带有自传性质的文集《伊斯坦布尔》，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牢牢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和研究者的目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和《伊斯坦布尔》是国外学者们研究的重中之重。他的作品《雪》在2004年被评为《纽约时报》选出的最好十本书之一。《黑书》被认为是帕慕克最复杂诡异的一部作品。

2、期刊论文和书评：《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不久，一些期刊研究和书评就相继出现。关于《我的名字叫红》的期刊论文有：

查伊安·霍华德的《可怕真相的诉说者》(Zfowart / , Teller of the Awful Truth. Time Canada, No. 19, Vol. 167, 2006);

盖伊曼内斯·雅培在《传统与现代》中对帕慕克作品中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对立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与总结 (Mannes-Abbott, Gvy "Ancient and Modern. //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8. 360, 7 July 1995),

杉木在《奥尔罕·帕慕克与奥斯曼主题》这一文章中对《我的名字叫红》中的“奥斯曼”(即在不同作品中所描述的有关奥斯曼历史)主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与解构(ERDAG FOKNAR, Orhan Pamuk and the "Ot toman " Theme, World Literature Today 80. 6, 2007)等等。

但几乎所有的期刊都只对《我的名字叫红》的文化主旨进行研究，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伊斯兰教的尊崇与背叛，以及奥斯曼主题的探索。

关于《我的名字叫红》的书评有：

2001年弗瑞林·莫林在《新政治家》发表的《我的名字叫红——书评》[Freely, Maureen, MY NAME IS RED (Book Review). New Statesman, , No.

4552, Vol. 130 2001);

希巴德·艾伦在《当代小说纵观》发表的《我的名字叫红》书评(Hibbard, Allen, My Name is Red,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No. 3, Vol. 20 2001) 等。

3、研究方向

有些研究者关注帕慕克作品中体现的政治倾向,但更多的研究者是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切入研究。

如伊恩·沃德(Ian Ward)的《莎比娜贵妇和戴头巾的女孩》(Shabina Begum and the Headscarf Girls),该文从人物所表现的身份困境角度出发,重点挖掘了被逼摘除头巾的伊斯兰女学生的矛盾心理过程,对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困境问题进行充分阐释;

小布拉姆(Gabriel Noah Brahm Jr))的《解读石英城市安卡拉:关于奥尔罕·帕慕克所在的中东地区两年神奇的思考》(Reading City of Quartz in Ankara: Two Years of Magical Thinking in Orhan Pamuk's Middle East),该部作品主要通过分析土耳其的历史及其现状来深入挖掘帕慕克创作主题的特色。

对于帕慕克作品中所表现的文化冲突主题中关于传统和现代性冲突的问题,国外诸多报纸如卫报、纽约时报等也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复杂的思考:对权威主义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的讨论,比如 The Walker In The City、A Blizzard Of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Turkey-,对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比较,比如 Turkish Writer Captives-,讨论东西方的冲突与融合,Clash Of Culture、Tkrfej。据帕慕克英文网站和外文期刊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国外对帕慕克的研究差不多涉及了他全部的作品,研究内容涉及伊斯兰世界、“奥斯曼”主题、文化冲突等方面。

二、国内研究现状

1、译本: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只有《我的名字叫红》有了中译本。2006年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帕慕克作品的才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至今帕慕克的十部作品都有了中译本,其中包括《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寂静的房子》、《白色城堡》、《黑书》、《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纯真博物馆》等八部小说,以及一部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本文集《别样的色彩》,还有诺顿讲演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2、三次演讲: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共同邀请,帕慕克于2008年5月21日到31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11天的旅行。帕慕克在北京发表了三次演讲。

5月22日上午,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我们究竟是谁?——在卡尔斯与法兰克福”的演讲。他谈及小说艺术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何处理作者与他想象中的读者的问题。帕慕克描述了自己在创作《雪》的过程中,为了亲身体验主人公卡的生活状态和感受,去法兰克福和卡尔斯——故事发生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事实上,这是他每写一部小说前必做的调研。对于小说的本质,帕慕克认为,正是小说的神奇魅力使得作者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当作所有人

的故事向读者展现,同时也能够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来书写。他认为,每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的最大喜悦来自进入别人的生活并赋予它生命。

5月24上午,帕慕克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发表演讲“隐含作者”。帕慕克阐释了他对“隐含作者”这一理论原则的理解。伊塞尔的“读者导向”理论认为,小说的含义既不完全存在于文本,也不完全存在于情境,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契合点。小说的含义只有被阅读时才会浮现。所谓隐含读者,实际就是给读者指派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帕慕克进一步认为,每一部尚未下笔而处于构想、计划中的小说都必然存在着一个隐含作者。

5月24日下午,帕慕克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作了题为“你为谁而写作?凝视故乡的忧郁灵魂”的演讲。他认为小说艺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民族艺术,小说是随着19世纪民族国家的崛起而兴盛的文本。他认为存在他自身文化之外的传统中汲取养分的“世界性”的小说家,也存在从本土文化中吸取营养的“本土性”的小说家。无论是“本土的”还是“世界性”的小说家都应该是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

帕慕克此次访华的演讲、访谈以及一些学者的研究论文汇编为一本《帕慕克在十字路口》出版发行。

3、研究方向

“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对帕慕克的评价。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评价十分准确。在帕慕克的小说创作之中,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关系确实是贯穿始终的线索。可以说这是帕慕克小说中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帕慕克在小说《新人生》的中文版序言里第一句话就说:“在我所有的小说中都有一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

A、因此许多研究者着眼于从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以及文化身份等角度来研究帕慕克。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周欢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视野下的帕慕克小说及其小说人物》(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张可利的《论帕慕克小说的文化混杂性》(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李蒙的《帕慕克小说中的文明冲突与对话》(黑龙江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张猫的《奥尔罕·帕慕克作品中的“身份”问题》(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裴蓓的《论奥尔罕·帕慕克小说中的文化身份意识》(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王玲的《帕慕克作品中的文化身份探讨:〈黑书〉和〈雪〉浅析》(重庆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朱美娟的《身份界定与文化融合——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的探索性特征分析》(苏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等。

B、还有研究者从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出发研究帕慕克小说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性。例如,陆建德的《意识形态的颜色一评〈我的名字叫红〉》(上、下《书城》2007年第5、6期),论文结合伊斯坦布尔历史与土耳其细密画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的色彩蕴含的意识形态性。

C、还有些研究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帕慕克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主要涉及的理论有意识流、陌生化、不确定性、钟摆理论、对话性以及不可靠叙事者

等。

例如,王志杰的《帕慕克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暨南大学 2011 年硕士论文)论文主要分析了帕慕克小说中的叙事者和意识流的叙事技巧,并且认为帕慕克的小说超越了传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完成了叙事上的第二次转向;

艾娟的《帕慕克小说的叙事艺术》(湖北大学 2010 年硕士论文),论文主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手法从叙述视角、叙事结构和话语模式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帕慕克小说的叙事技巧。

陈福兰的《〈我的名字叫红〉不可靠叙事者研究》(湘潭大学 2011 年硕士论文),论文从叙事者的多重性、事者的陌生化和叙事者的对话性三个方面论述了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的叙事者的不可靠性;

窦波的《奥尔罕的钟摆——帕慕克小说艺术与文化认知发微》(东北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论文),窦波认为帕慕克在小说艺术创作和文化关系思考中都存在钟摆对称性,他甚至认为钟摆对称性是文学的通约法则,宣称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钟摆对称性存在的根本原因。

2012 年杨中举关于帕慕克小说的研究专著《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出版,这也是国内第一部整体上讨论帕慕克小说叙事艺术的专著。在书中杨中举以“呼愁”为线索逐一分析帕慕克已出版的八本小说和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笔者认为,用“呼愁”一词统领全书虽然显得比较完整,中心较为明确。但帕慕克小说是具有丰富意蕴的,这样的概括就显得有一定的片面性了。但总的来说,当前国内关于帕慕克的研究仍然不足,仍需要更多学者的努力。

而关注到帕慕克小说中空间性的论文目前只有几篇,张虎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空间权力分析》(《当代外国文学》2008 年第 4 期),其研究对象为帕慕克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论者将福柯的“权力”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思想相结合,主要从话语空间、建筑空间和日常空间三个方面对文本进行空间权力分析,最终揭示伊斯坦布尔城市表面下的空间分裂与权力抗衡。以及赵新泽《在空间诗学视野下的帕慕克小说》(《西南交通大学》2013 年。)

这些具有综合性的专题研究,试图佐证解析帕慕克创作中更为核心的几个问题,它们不仅贯穿于帕慕克的一生创作与所有作品中,而且是与本文每一章节的研究关联、互补的。因为帕慕克的写作主要有两个文化源头,一是苏非神秘主义,一是后现代主义。由此发轫的“多余”的主人公与“媚俗”的爱情叙事的主题——其实,它们才是帕慕克文化观的核心部分。此外,每一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自传性写作,我们做的《我的名字叫红的研究》,也是关于帕慕克的研究。所以本文意图在建立一个客观的帕慕克研究现状体系,它既是对以往帕慕克研究的一个批评性总结,同时,也将为今后的评论与研究提供一个系统、详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奥尔罕·帕慕克著《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 奥尔罕·帕慕克著《雪》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3] 奥尔罕·帕慕克著《白色城堡》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4] 奥尔罕·帕慕克著《伊斯坦布尔 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5] 杨中举著:《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 [6]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J].当代外国文学,2007(01).
- [7] 沈志兴:《奥尔罕·帕慕克:发现文明冲突与交错的新象征》[J].南方人物周刊,2006(26).
- [8] 周欢:《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视野下的帕慕克小说及其小说人物》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指导老师:赵炎秋